

# 共生与流变: 媒介视阈下的口述历史

孟志军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传播系,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 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媒介技术的革新息息相关, 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 口述历史可以分为人工手抄时期、声音录制时期、影像口述历史时期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 口述历史与新闻界关系密切, 例如影像口述历史与访谈类的电视节目之间就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 极易混淆, 所以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区分, 它们在目的、工作方法、受众群体、访谈方法等四个层面都存在着很多差别。

**关键词:** 影像; 口述历史; 媒介; 共生; 流变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6)10-0120-05

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学科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力, 对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给这些学科带来变革, 开辟了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新途径。其中, 口述历史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 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口述历史的演变

口述历史的普及化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方便又相当便宜的卡式录音机和专供录影带使用的V8一类摄影机的问世, 大大推动了口述历史的普及化<sup>[1]</sup>。著名青年口述历史学者杨祥银博士认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的爆炸式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源于这些记录设备的普及性应用。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 口述历史不仅能够保存传统的文字资料, 而且能够提供更为生动和鲜活的音频与视频资料, 使它真正成为声音和影像的历史”<sup>[2]</sup>。而当代社会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之所以能够喷涌而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口述访谈记录工具, 或者说口述记录媒介变得更容易获取和掌握, 媒介技术的发展给了普通大众一种表达“个体记忆”的机会。

口述历史的发展得益于媒介技术的革新, 随着

媒介技术的变革口述历史也正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特别是在口述历史的实践领域更是如此。口述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受技术驱动的方法, 所以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方法和理念。

“在历史学界外部, 随着大众媒体全方位的扩展以及记录材料和技术的进步(录音和录像等), 以前被历史压制的声音通过媒体并以‘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 许多被历史有意和无意消声的群体, 如妇女、儿童、少数族裔、战争受害者等, 以‘记忆’的名义发出他们的呼声。”<sup>[3]</sup>媒介技术正是唤醒普通大众沉睡的“个体记忆”的有力工具, “个体记忆”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展现出来。根据媒介技术在口述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可以将口述历史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人工手抄时期。口述访谈记录留下的手抄本比有声录音要早许多, 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今天历史学家引用的书面资料本身从源头上看是口述性的。”<sup>[4]</sup>这一时期主要是指现代口述历史诞生之前的诸多形态, 现代意义上的录音设备还没有出现, 访谈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抄写形式进行。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 口述历史缓慢成长, 这一阶段的口述访谈对象多是“帝王将相”的社会精英阶层。

(二) 声音录制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

**收稿日期:** 2016-04-17

**基金项目:** 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wsk163)

**作者简介:** 孟志军(1978—), 男, 河北献县人,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传播系副教授。

录音设备的使用,口述访谈记录工具以录音设备为主,经过了蜡盘滚筒、钢丝录音机、盘式录音机、盒式磁带录音机、数码录音机、光碟和闪存卡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出现为口述历史收集访谈证据提供了更系统的方法。1935年,瑞典方言与民俗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Dialect and Folklore Research)在一次田野工作中常规地使用了录音机器——这也许是为了历史研究的目的而这样做的第一个组织<sup>[5]</sup>。特别是盘式录音机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1948年盘式录音机开始在市场上销售,同年,世界上第一个口述历史档案馆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盒式磁带录音机面世,从此盒式磁带录音机成为口述历史最主要的记录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盒式磁带录音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60年代口述历史大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在此时口述历史为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使用。著名口述历史专家保尔·汤普逊充分肯定了录音技术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技术基础确实以极大的速度在发展。第一台记录机器,留声机,在1877年被发明出来,而钢丝录音机则恰好在1900年之前被发明出来。到30年代,一种经过相当大改良的型号已经可以胜任愉快地用于广播了。十年以后,磁带诞生了,第一台轴对轴型式的磁带录音机开始在市场上销售。便宜得多的盒式磁带录音机在60年代初面世。今天它已是任何想要录音机搜集证据的历史学家都可以使用的了。技术的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现代口述史运动在大多数世纪里,在得到大量的、并且常常是国家的资助的计划中都有其起源,却直到最近才作为扩散性的地方史和通俗史的一种形式得到同样迅速的成长。”<sup>[6]</sup>

每次技术更新,都让录音设备比上一代更加廉价和便于操作,这也就促使更多的人进入口述历史的实践领域。在录音带价格昂贵时期,有时候为了节省成本,有人整理出口述录音带的文本之后把录音带抹掉重新使用。如果没有简便廉价的录音设备出现,人类的口述历史也许只能停留在手工抄写时期。口述历史专家保尔·汤普逊在考察磁带录音机对于历史学的作用时就曾指出,“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到达了电话与磁带录音机的年代:交流沟通方法的变化终将给历史的面貌带来与过去的手稿、印刷出版和档案同样重要的改变。”<sup>[7]</sup>

### (三)从听觉到视觉:口述历史与影像口述历史。

由于摄像机价格和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录音设备,所以口述历史选择使用摄像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远远大于选择使用录音设备。这就导致在现实中口述历史选择使用摄像机的情况并不多见,只有大型口述历史项目才有可能使用摄像机,特别是在21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是,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席卷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各种录音设备和影像拍摄设备层出不穷,体积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低廉,操作越来越简便。影像拍摄设备尤其如此,以前影像的拍摄与观看都需要借助专业设备,但是今天的摄像机已经数字化、无带化,拍摄完成的影像可以在个人电脑上轻易地观看与复制,为影像素材的流通与传播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摄像机的操作使用上,早期摄像机的使用需要灯光师和助理的协同工作,小型数码摄像机诞生以后,采访者一个人就可以独立操作摄像机,这就使先前令口述历史访谈者望而却步的影像录制变得唾手可得。中国电影资料馆主持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在访谈中全部使用了摄像机进行影像录制。今天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毫不夸张地讲只需带上一部智能手机就足够了。所以21世纪可以看成是口述历史影像录制时期的开始,虽然口述历史使用摄像机在时间上肯定会更早,但是有条件大规模地普遍使用摄像机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

摄像机的小型化和操作便捷化使其在口述访谈现场变得更隐蔽,“不引人注意的设备使受访者处于一个放松的环境中,使他们自然舒服地对着摄像机讲述,就像对着录音机一样”<sup>[8]</sup>。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享”,这也是互联网的最基本特征。数字化革命深刻地影响和扩展了口述历史的工作实践、方法、保存和展示。影像录制也扩展了口述历史访谈在公众展示中的潜在应用,能够为博物馆展览、纪录片、网站等所展示和分享。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不同时期所使用的访谈记录工具有所交叉,摄像机和录音设备可能会同时使用。总之,口述历史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每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让口述历史获得了长足发展,媒介技术的改变启迪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方法和观念,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一书的

序言中写道：“口述历史的出现还归功于机械设备的进步，从磁带录音机到抄录器再到摄影机，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已经迅速步入了新的数字化时代。研究者们愿意采用新技术来改善他们的访谈和记录技术，扩大对自己工作的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他们自己的历史。”<sup>[9]</sup>

## 二、影像口述历史与访谈类电视节目

口述历史和新闻界关系非常密切。很多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项目并非由历史学家主持，而是由新闻从业人员发起，例如现代口述历史的创立者艾伦·内文斯(Aevins Nevins)就是由新闻界转行的历史学者，曾任职于《世界报》社论版，194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口述历史档案馆。美国口述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斯塔兹·泰克尔(Studs Terkel)则是芝加哥一档广播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著名电视人崔永元所做的口述历史《我的抗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口述历史和新闻界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存在着多个层面的交集。新闻从业者的特性是关注当下社会，这样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历史中去；而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一定是今天还健在的人，是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口述历史和新闻记者有着共同的采访对象。特别是它们都使用共同的工作方法——口述访谈，而采访恰恰是新闻记者的优势，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则远远逊色于新闻记者。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记忆就是今天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和现实密切相关，它不仅可以帮助抢救历史记忆，同时也可以记录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新闻不仅仅是当今社会的呈现，有时候也去挖掘已经逝去的历史。所以有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确实被模糊了。很多媒体的作品打上了“口述历史”的标签，例如《北京青年报》的“口述实录”栏目、《杭州日报》的副刊“倾听”版，2005年凤凰卫视开办的新栏目直接干脆就命名为《口述历史》。

数量众多的访谈类电视节目是否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呢？有学者就把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归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东方卫视等已经有一批实际上是口述历史的节目，如水均益主持的《高端访问》，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崔永元主持的《电影传奇》，陈鲁豫主持的《鲁豫有约》，曹可凡主持的《可凡倾听》等均属于较为典

型的口述历史节目。”<sup>[10]</sup>这些电视节目中多多少少确实可以看到口述历史的影子。吉林大学蒋蕾教授认为，口述历史和新闻采访在人物关系、获取信息手段和职业伦理道德等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sup>[11]</sup>。尽管它们之间有这么多共通和相似之处，但是毕竟它们并不能够画等号。虽然从事口述历史不需要历史学位，并不是说任何人做的任何录音都是口述历史<sup>[12]</sup>。所以非常有必要厘清口述历史和访谈类电视节目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影像口述历史与访谈类电视节目之间的具体区别，否则就很有可能泛化口述历史。

(一)目的不同。影像口述历史和访谈类电视节目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最初的目的性，而不在于实践主体，主体的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影像口述历史的根本目的是寻找个体记忆和历史真相，而访谈类电视节目的根本目的在于商业盈利。也就是说，影像口述历史只需考虑口述内容真假的问题，而访谈类电视节目则首先要考虑收视率问题，因为收视率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生存下去。口述访谈只是访谈类电视节目一种必要的工作方法和手段，个体记忆和历史在访谈类电视节目中也仅仅是被观看和被消费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目的之所在，历史记忆却是影像口述历史的核心目的所在。正像中国传媒大学许行明先生所说：“这种差异典型的表现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口述历史讲述者背后的历史史实，而电视创作者关注的是电视摄像机前的口述历史表达者的表达。”<sup>[13]</sup>在很多时候，电视节目中的讲述者所说内容是否真实往往需要观众自己进行判断，但是口述历史对历史学家来说必须由他们根据专业知识和积淀进行判断，唐德刚在做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时，就会指出李宗仁某个口述细节不实。当然这并不是说真相对电视节目不重要，因为如果电视节目故意编造谎言就会为观众所唾弃。对访谈类电视节目最终起作用的是商业逻辑，资本力量始终控制着访谈类电视节目。总之，影像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未来，而访谈类电视节目只着眼于当下。

(二)方法不一。目的上的不同一定会造成工作方法上的差异。访谈类电视节目正因为商业上的诉求，所以为了取悦观众就会追求戏剧效果，往往加入一些艺术创作手段，但是影像口述历史几乎放弃艺术性的创作手段，仅仅就是使用摄像机进行单

纯的影像记录。例如，在拍摄阶段，灯光、摄像机的运动、诸如摇臂等大型的摄像机辅助设备都会出现在访谈类电视节目制作中。拍摄完成的口述访谈内容只是访谈类电视节目的一部分，它一般还需要纪实段落、解说段落来共同构成一期电视节目，而访谈内容却几乎就是口述历史的全部。另外，电视节目中拍摄的访谈素材未选用的部分，或者叫超拍部分，往往不会进行长期保存。

很难想象访谈类电视节目或者纪录片只有一个人在侃侃而谈<sup>①</sup>。因为普通观众根本没有耐性可以看完一个人冗长的访谈，所以一期完整的访谈电视节目必须使用视觉特效、音乐、旁白、解说词等手段。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对纪录片中的人物采访做出规定，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常务副总监史博恩先生在很多次谈论中都强调故事性和故事化，甚至提到纪录片中人物的对话不应该超过7秒，否则便会枯燥，没有人爱看了<sup>[14]</sup>。所以在后期剪辑时，电视节目创作者会根据创作需要任意切割访谈内容并重新搭配前后次序，或者设置悬念，或者加剧冲突，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吸引观众眼球。但是在影像口述历史中，访谈内容的使用要谨慎得多，《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里“对于公众与专业本身应尽的责任”部分中第十二款中就规定：“使用和引用口述历史时，应该和使用其他史料一样的谨慎小心，并且采用相同的标准。使用者有责任维护受访者声音的完整性，不能误解受访者的话，也不能不管前后脉络，任意摘用”<sup>[15]</sup>。电视节目挖掘的是故事，而口述历史寻找的是真相。电视创作者与其说是利用口述访谈获取“历史真相”，倒不如说是在寻找“历史故事”，因为在电视创作中“故事”往往比“真相”要重要得多。

（三）摄像机背后的不同世界。“摄像机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介入生活，它的在场意味着强势的、侵略性的记录和展示，被拍摄者会顾及公众的话语权而隐藏自己全部的想法。”<sup>[16]</sup>摄像机通常会给受访者带来压力，当人们面对摄像机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表演，按照自身的利益进行叙述。在访谈类电视节目中，摄像机会带给受访者更强大的压力，因为受访者知道摄像机背后是一个万人瞩目的世界，摄像机不仅是记录工具也是一个通向世界的窗

口，受访者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公众，受访者的每个细节都有可能被放大。影像口述历史中的摄像机也许仅仅就是个记录工具，摄像机背后通常是研究人员，受众群体相当小，其使用范围也通常要进行限定，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的概率要小得多。

受访者面对的受众群体不同导致了其心态不一样。当受访者面对摄像机时，特别是当受访者知道会被媒体播放时，他面对的是摄像机背后更多的受众，所以他很有可能会表演。摄影机的在场，观众的想象性关系又给他们带来了一种“额外的关注感”，从而进行选择记忆和陈述，从而忽视、夸大乃至捏造一些历史细节<sup>[17]</sup>。可见在电视节目中，“将自己作为被拍摄而且要被别人观看的影像展现在摄像镜头前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戴上了面具，进入了非真实状态”<sup>[18]</sup>。口述历史的影像素材完全可以使用到电视节目中去，那么电视节目中口述访谈，是否具有史料价值呢？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以电视为媒介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口述史的形式进行采访，他们通常会采访那些在20世纪的重大事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人物。这样重要的直接证据可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需要谨慎地予以对待：被采访者会尝试使他们对事件的想法被记录在案。”<sup>[19]</sup>

（四）访谈方法不同。前面讲口述历史和访谈类电视节目都共同使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而且口述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新闻采访的技巧。但是它们在采访上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影像口述历史的采访基本上不受时间限制，多多益善，但是访谈类电视节目中的访谈则受到时间约束，时间一般较短，问题的设置常常是以电视节目的主题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影像口述历史是在深挖一口井，而访谈类电视节目则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在影像口述历史中受访者要自由得多，可以敞开心扉地漫谈，访谈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就称访谈者“必须压抑着想说话的冲动，做个安静的倾听者”。在访谈类电视节目中采访者却可以随时打断采访对象。“记者一般不让采访对象漫谈，而口述历史访谈则让对方尽情述说。新闻采访时一问一答，记者要进行大量的追问，而口述历史以受访者讲述为主，访谈者以眼神与对方沟通、

<sup>①</sup>凡事都有特例，黑勒尔执导的纪录片《盲点：希特勒的秘书》，长达90分钟的独白式口述中，没有历史资料、没有模拟场景，只有一位老妇人对着镜头回忆她印象中的希特勒，但是这样的例子极其罕见。

很少插话。特别是在录像记录的口述历史访谈中,如果只有一台摄像机,画面集中在受访者身上,访谈者的形象和声音是淡化的——甚至不出镜和不出声。”<sup>[20]</sup>可以这样说,采访类电视节目是采访的艺术,口述历史则是倾听的艺术。

### 三、真实的幻想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但是口述历史可信吗?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传统历史学家的质疑,有人这样批评著名口述历史学者保罗·汤普森的代表作《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他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毕竟是那些继续活下来而变成‘乔治王时代的人’和当前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在这么多年间,一些记忆已经消退,或也许至少受到随后经历的影响。他们童年的记忆,难道不是有很多是在他们年龄较大时回忆的产物吗?他们后来也许会读到的自传或小说难道不会强化某些印象而弱化其他印象吗?电影或电视节目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意识产生某种影响吗?”<sup>[21]</sup>这一连串的疑问同时也是抛给每一位口述历史学者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切中了口述历史的要害,虽然口述历史学者完全可以反问传统史学的文献资料的可信度问题。但是反唇相讥过后还要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无疑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时代都有局限,作为历史当事人和亲历者(口述者),毫无疑问会受到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主体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等都会影响到其对口述历史问题的态度选择。”<sup>[22]</sup>

毫无疑问,真实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是一个充满迷雾的泥潭,又是一个我们描述世界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前面讲影像口述历史是一种全息的口述历史,能够增加受访者的口述内容可信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恰恰由于摄像机的介入,对访谈者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其可信程度。别说弄清楚逝去历史的真相,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要想弄清楚真相也并非易事。所以,真相也许就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过去的声音”也必然同时是现在的声音<sup>[23]</sup>。

### 参考文献:

[1] Laurie Mercier, Mary Murphy, Linda

Peavy, Diane Sands, and Ursula Smith, *Molders and Shapers: Montana Women as Community Builders: An Oral History Sampler and Guide*[M]. Helena: Montana Historical Society Office, 1987: 9-19.

[2] 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J].社会科学战线, 2011, (2): 68-79.

[3]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 2010, (3): 205-219.

[4][19][23]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63; 283; 270.

[5][6][7]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78; 68; 68.

[8] 唐纳德·里奇.技术带来改变:口述史学的最新趋势[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2-17.

[9][12][15]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1; 10; 263.

[10] 孙晓红.电视口述历史节目:口述历史新形态[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6, (7): 56-58.

[11][20] 蒋蕾.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的异同[J].新闻记者, 2011, (9): 74-78.

[13] 许行明.历史文本与影像文本[J].现代传播, 2008, (3): 74-77.

[14] 冷淞.用娱乐的方式教育受众——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成功模式探究[J].声屏世界, 2006, (10): 62-63.

[16] 张同道.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M].北京:同心出版社, 2009: 337.

[17] 蔡骥.影像传播中的历史建构与消解——解析电视传播中的“口述历史”现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 (2): 59-66.

[18] 赵爱国, 刘磊.从“没有记忆的镜子”看档案记忆观[J].档案学通讯, 2014, (1): 4-7.

[21] Stephen Koss, review of Paul Thompson's *The Edwardians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5 December, 1975: 1436.

[22] 徐晓杭.口述历史:寻找新闻的“富矿”——口述史是历史和新闻的交集[J].新闻实践, 2012, (11): 70-73.

责任编辑:黎伟盛